

被采访人:李埏

采访人:仲伟民

时间:2004年10月13日上午10点

地点:云南大学李埏先生家

陪同人员:吴晓亮、林文勋

2004年是《历史研究》创刊五十周年纪念,为此编辑部决定出版系列丛书,其中包括一部口述史,主要内容是采访与《历史研究》有密切关系的老作者,我接到的任务之一就是采访李埏等先生。但因为后来编辑部发生了一系列变化,以及我个人的工作调动,口述工作开展很不顺利。尽管如此,2004年我仍专门到昆明采访了李埏先生,李先生兴致很高,访谈进行了约三个小时。回京后,我整理了录音,形成了一个粗糙的文字稿。但难为情的是,因为我的马虎,李埏先生的访谈录音以及整理的访谈稿,后来竟然不知所踪,心里非常懊恼。今年年初,接到云南大学历史学院“李埏先生逝世十周年纪念暨学术研讨会”的通知后,我又想起了那次访谈。巧合的是,不久前的一次会议上,我同《历史研究》原总编辑徐思彦谈及此事,她说她保留有访谈稿,我喜出望外,真是太感谢她了!正是她的细心,使这个珍贵的访谈得以重生。现在我略加整理并展示给大家,以表示对李先生的深情怀念!

我与侯外庐、郭沫若等人的学术交往

——李埏先生口述

■仲伟民

仲伟民(仲):今年是《历史研究》创刊50周年纪念,我们想出版一套丛书作为纪念,其中包括《历史研究与中国历史学50年——关于《历史研究》的口述史》,因为《历史研究》杂志从某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历史学50年的历程。先生在《历史研究》发表过许多篇文章,与《历史研究》有很深的渊源,而且对这个杂志一直都很关注,所以我们想请先生谈谈您与《历史研究》有关的经历和事情。

李埏(李):我对这个题目很感兴趣。1954年《历史研究》创刊,第1期发表了陈寅恪、侯外庐、范文澜先生的文章,还有向达先生的文章。我看了侯先生的文章后,很感兴趣。

我的恩师是张荫麟先生,我一直学习经济史,主要是宋代经济史。我到西南联大后,主要还是请他指导。张先生去世后,我的研究并没有中断。解放初期那几年,运动不断,根本没有心思写什么论文,也不敢写。后来《历史研究》创刊了,我看到上面有前面几位先生的文章,感觉到《历史研究》还不是否定一切,不是对过去的一切全否定,于是我也想写点东西。在《历史研究》创刊号中,我对侯先生的文章特别感兴趣,因为他涉及的专题和我有关系。那个时候,我没见过侯先生,也不知道他。看了他的文章后,我就想写点笔记,读后感之类的。刚好不久后学校要评职称,需要每人提供一篇论文,于是我就写了一篇文章,这就是后来关于土地所有制的那篇文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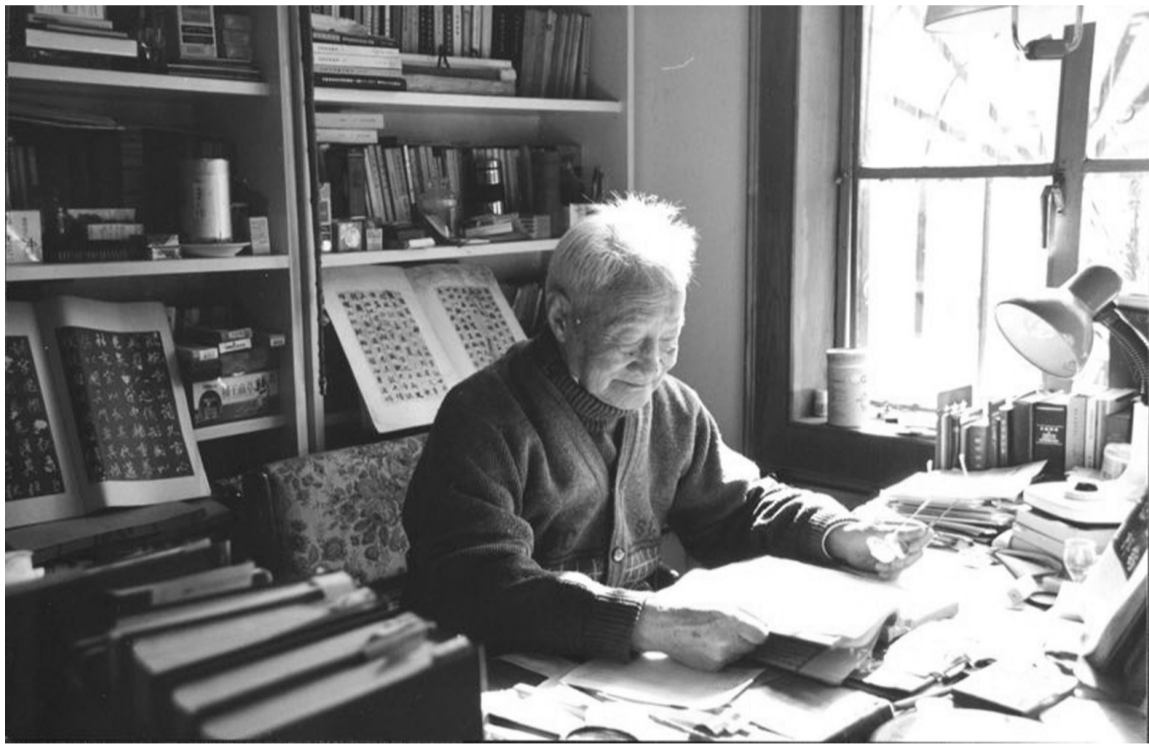
仲:这篇文章影响很大。

李:文章写好后交给学校,当时就是为了提职称。后来职称通过了。校党委书记鼓励我们向外投稿,因为我们这里没有刊物,于是我就投给了《历史研究》。当时我什么信都没写,文章也没有写,卷起来作为平信寄过去了,想编辑部能收到就收到,收不到就拉倒,自己也不太自信,搞不清楚这篇文章有什么价值。不久,就收到了编辑部的回信,说文章太长了,问是不是能砍掉一些,因为文章将近4万字。哎呀,我写这篇文章用了半个月,修改和压缩则用了一个半月。编辑部要求压缩到23000字,我改成了23200字。寄去后不久,上面派我去参加一个会议,于是我就到了北京。我先去见了向达先生,因为他是我研究生时期的导师。向达先生说我的文章写得不错,我问先生怎么知道啊。向先生说,有一天,侯外庐先生到历史所二所开会,二所即现在的历史所,当时属于中国科学院。当时一所是侯外庐当所长,二所是侯外庐当所长,三所是范文澜当所长。郭沫若先生很少来开会,他忙得很。一二所常常合在一起开会,由侯先生主持。向先生说,侯先生一般平时来得很早,从来不到,但那天侯先生迟到了一刻钟还多。侯先生来到后赶忙说,对不起,对不起,今天我迟到了,因为我修改一篇文章,我对那篇文章很感兴趣,一口气把那篇文章看完,结果就迟到了。

仲:侯先生就是看的您那篇文章吧?

李:是的。当时有人问是谁的文章,侯先生说,我也不知道,是从昆明寄来的,名字也很怪,叫李埏,不知道是何许人也。向达先生说,我知道这个人。侯先生问,你怎么知道呢?向先生说,我当然知道,他是我的学生。于是,向先生给大家介绍了我的情况。侯先生说,这篇文章我们要用。向先生说,那好极了。

不久我出差到北京,开教学大纲的会议。《历史研究》编辑部知道我北京开会,于是他们通知我回来,最好到编辑部来一趟。一位编辑拿出稿子对我说,你看上面有很



多批语,是侯先生审的稿,侯先生批了很多意见,希望你拿去看一看,你是后辈,虚心一点。于是我把稿子就拿回去看,当天晚上看,第二天我就送回到编辑部。编辑问,你怎么改得那么快?我说,我自己的文章,很容易看,当然看得快了。编辑问,你认为侯先生的意见怎么样?我说,侯先生主要有三条意见,但第一条意见我不能接受。侯先生希望我从农村公社讲起,从商周讲起,这个我现在做不到,因为商周我没有研究过。侯先生的意见很好,但如果照侯先生的意见做,我只好三年以后再写文章寄过来。编辑说,不行不行,不能拖那么长时间。我说,文章要是现在登,侯先生的第一条意见我只好保留,其他我都能照侯先生的意见改,你们要是不同意,那就算了。编辑说,这个事情你自己看着办,不过你是后辈,你应该虚心一点。

仲:最后编辑部是不是尊重了您的意见?您还记得那位编辑的名字吗?

李:那位编辑姓甚名谁,我不记得了。看来编辑部是尊重了我的意见,文章不久后就发表出来了。对我来说,这篇文章非常重要。这么来说吧,以前史学界,除了云南大学历史系知道有个李埏外,没有谁知道有个李埏。这篇文章出来以后,很多人都知道了云南大学有个李埏。后来我对我的朋友说,什么叫成名之作?这就叫成名之作。当时很多人打听,李埏何许人也。有一次我到香港大学,某教授让我打听谁是李埏,我说你不要打听,我就是李埏,他说我要向你学习,后来我们成为了好朋友。

我同《历史研究》的关系非同一般,我走进史学界,就是通过《历史研究》。当时云南很多人订阅《历史研究》,但第1期没有,因为《历史研究》第1期出版后才订。后来我通过历史所买回来三本第1期《历史研究》,一本送资料室,一本我自己留存,另一本送给了自己。我有至今为止整套的《历史研究》,一本不缺,已捐献给我们历史研究所了。我现在岁数不小了,需要处理一下我的藏书。历史研究所地方太小,没有那么多书架,还没有陈列出来。

仲:您后来与侯先生有没有书信往来?

李:有,往来书信很多了。当时《历史研究》编辑部把侯先生改的批语给我看,我问把稿子拿回去看可以吗?他们说可以,我就拿回去了。后来我把有侯先生批语的稿子留下了,拿了另一份稿子给编辑部。我对他们说,侯先生的意见我照改了,没必要看原稿了。现在侯先生的稿子我仍然完好地保留着。

仲:我能不能看看侯先生的批语?拍几张照?

李:我可能一下子找不出来,不过以后我找出来可以寄给你。

仲:我要一件复印件就可以了,原件还是您保存。我们出版自己的文章,很容易看,当然看得快了。编辑问,你认为侯先生的意见怎么样?我说,侯先生主要有三条意见,但第一条意见我不能接受。侯先生希望我从农村公社讲起,从商周讲起,这个我现在做不到,因为商周我没有研究过。侯先生的意见很好,但如果照侯先生的意见做,我只好三年以后再写文章寄过来。编辑说,不行不行,不能拖那么长时间。我说,文章要是现在登,侯先生的第一条意见我只好保留,其他我都能照侯先生的意见改,你们要是不同意,那就算了。编辑说,这个事情你自己看着办,不过你是后辈,你应该虚心一点。

李:我保存侯先生的批语是一种纪念,因为侯先生已经去世了,又是他亲笔写的。我记得侯先生的批语还是毛笔写的。

仲:当时几位先生都是用毛笔写的,我曾经看到过他们留存的一些东西。

李:《历史研究》发表这篇文章在我一生中非常重要,可以说具有关键性的作用。后来因为政治运动,同《历史研究》就没有联系了。到了60年代,我把一篇文章进行了修改,花了很大气力。寄到编辑部后,编辑部让我压缩。我说压缩不够,需要重写。我不知道编辑部还保存原稿没有,如果有,对我来说那是很宝贵的。

仲:我回去一定查一下。

李:我当时写得很认真,用小楷写的。每写错一个字,我就用小刀挖掉,然后垫上纸补上,不改在旁边。我拿原稿和改后的稿子给我儿子看,训练他。我的儿子叫李伯重,当时他还没有上大学。我说你先看这篇文章(原稿),认真地看一遍,这是你爸爸写的文章,看完后再看这一篇文章的修改稿。这一篇文章有40000多字,压缩掉一半,我问他,篇幅压缩掉那么多,意思少了没有。他说,意思没有少。我又问他,文字是哪一篇好,他说后一篇好,短的好。当时我就对他说,写文章不要啰里啰嗦,要精练。当然了,如果《历史研究》不求我压缩,文章就不会写得这样好。《历史研究》一度认为《历史研究》要求太苛刻了,现在我则引以为良师益友啊!

仲:您后来写文章都以此要求自己。

李:后来还写什么东西啊,也没有时间写了。自我批判都来不及了,“文革”中人都几乎不存在了,还写什么东西呀。

仲:后来《历史研究》也停刊了。

李:我认识《历史研究》编辑部的庞朴、高世瑜等。“文革”之后,我投过稿,是札记,因为写那种长篇大论的文章已经不行了,我积累的卡片在“文革”中被红卫兵抄去了,拿去烧火了,再让我去重新收集资料已经不可能了,老本已经没有了。所以,我就只能写点札记。他们二位(指林文勋和吴晓亮,李先生的二位得意弟子)也帮助我,出了一个集子,论述《史记·货殖列

论》有个肖黎,我很佩服他的见解。

仲:我同肖黎先生很熟悉,您为什么佩服他?

李:肖黎有本书叫《司马迁评传》,前后两次讲到这个问题,他认为司马迁很尊重老庄的思想。这就很矛盾啊,司马迁既尊重老庄,又拿过来批,为什么要在《货殖列传》里来批?《史记》不是有他们的传吗?为什么不在那里批?这一点我实在是有点不理解,“文革”后我花脑筋最多的就是这篇札记。我想司马迁引老子这段话,不是没有原因的,他不是为了批判老子。我从《货殖列传》抓住了一个线索,这就是改善生活。“生活”两个字就是他用的。我抓住了改善生活这条线,那么,生活的最高境界就是老子的这个话。就为分析这个问题,我写了这篇札记。这篇文章的责任编辑叫宋超。我后来给高世瑜写过一封信,我说你们把我的文章发表出来,我很感谢,但宋超帮我改了一个字,恐怕不是我原来的意思。

仲:这个事情,临来昆明之前,宋超特别叮嘱我,要我代他向您表示歉意,他说这个字改错了(听到这里,李先生和大家都笑了)。他现在记得非常清楚,说我到先生那儿一定要替他表示道歉。他说这个事情对他教训很大,说今后绝对不能随便改名家的文字,一定要问清楚查清楚。

李:就是一个“之”字,到底应该摆在前面,还是摆在后面,位置一颠倒,意思就完全不对了,主动语气变成被动语气了。当然这个错误是无关宏旨,是无所谓的。这纯粹是文人之间的笑话。宋超人很不错的,既然已经发表了,就没有必要更正了。我当时不好意思给宋超写信,就请高世瑜转告他,请宋超考虑考虑,我的意见对不对。“文革”之后,我给《历史研究》的文章就这一篇,尽管是一篇札记,但我花工夫可不少,比写土地关系那篇文章花的时间更多。

林:这里我要说两句。《历史研究》发表的李先生关于土地所有制那篇文章,对一个学者的成长和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,也对一个学者的家庭和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变化,可以说改变了这个家庭生活的状况。李先生的子女很多,在发表这篇文章之前,生活很困难,经常向周围的老师借钱。这篇文章发表之后,《历史研究》编辑部支付了460元钱的稿费,这在当时是不小的一笔钱。后来这篇文章又被两个地方先后转载,一个是《新华月报》,一个是《社会科学战线》,当时转载支付稿酬的办法是,按原刊物所付稿酬的一半付给,这样每个杂志又付了230块钱,总共又得到460块钱,这样李先生一下子经济上就翻身了。李先生还清了所有的小债,给每个孩子做了一件新的小棉袄,还有很多老师向他借钱。总之,这篇文章对改善一个学者的家庭经济状况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。

李:那时我的工资才120多元,一下子收到800多元,所以那时正是我交好运的时候(笑)!当时正在进行工资改革,高教等级分为12级,学校把我树为四级标兵,评的时候我正在北京,怎么评的我不清楚。回云南后,我才发现自己交了好运,收到了一大笔稿费,工资又提了两级。当时老师一般只提一级,我一年就提了两级。当然,我原来的工资太低了,为什么低呢?因为《解放初》有一段时间我离开云大,省政府文管会派我当云南省图书馆的馆长,我只在云大教一门选修课,所以云大两次工资改革都没有我的份,我的工资还是老样子。没有钱怎么办呢?我们系有一位姓江的教授,他很有钱,知道我困难,就借给我钱。我当时想,你借给我钱当然好,我很感谢,但

里哪有歌颂老子的。《光明日报》理论部有个肖黎,我很佩服他的见解。

李:肖黎有本书叫《司马迁评传》,前后两次讲到这个问题,他认为司马迁很尊重老庄的思想。这就很矛盾啊,司马迁既尊重老庄,又拿过来批,为什么要在《货殖列传》里来批?《史记》不是有他们的传吗?为什么不在那里批?这一点我实在是有点不理解,“文革”后我花脑筋最多的就是这篇札记。我想司马迁引老子这段话,不是没有原因的,他不是为了批判老子。我从《货殖列传》抓住了一个线索,这就是改善生活。“生活”两个字就是他用的。我抓住了改善生活这条线,那么,生活的最高境界就是老子的这个话。就为分析这个问题,我写了这篇札记。这篇文章的责任编辑叫宋超。我后来给高世瑜写过一封信,我说你们把我的文章发表出来,我很感谢,但宋超帮我改了一个字,恐怕不是我原来的意思。

李:我在北京开会的时候,侯外老来过会场一次。那是一个盛大的会议,全国的教学大纲会议,杨秀峰、周扬等都来了,很重视这个会。杨秀峰和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两位联名宴请全体代表。我和韩国馨先生坐在同一张桌子上。韩国馨先生和侯外庐先生有旧,韩先生对我说,我们去向侯外庐先生敬酒怎么样?我说好。于是我们两人到他的桌子那里去。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侯先生,如果不是韩先生带我去的话,我根本不知道哪一位是侯先生。敬完酒后,侯先生对我们俩说,历史研究所聘你们为兼任研究员。我当时不知道说什么好,只说谢谢,谢谢!其实,我当时的心里就像谢安听到了淝水之战胜利的消息(大笑)。按当时的规定,做兼任研究员,要给我1/4的工资,我在云南大学的工资200元,这样就要给我50元,一直给了我10年。10年中,这笔钱给我很大的帮助,同历史所的关系也比较密切。反右斗争开始后,我不了解情况,对历史系总支书记说,按照规定,我应该到历史研究所工作一段时间。他说我去问一问学校党委书记。党委书记不敢当。我们两个人一块吃饭,一块去,一块来。图书馆不开门的时候,我们就去万牲园(动物园)或北海玩。我们朝夕相处,直到离开北京。后来我在云南农村劳动整整一年,当时云大分批参加劳动,一去就是一年,主要是讲师以上的教授。我是第二批去的。除了春节回来一次,其他时间不能回家。劳动锻炼对我倒也是好事,以前我肩不能挑,手不能提,不到两个月,我就能和生产队里的强劳动力一样劳动。劳动对我很有好处,一年到头,我跟农民同吃同住。以前我不知道农业生产是怎么回事,通过劳动了解了。另外一个好处是,我到凉山两个月,在那里跟翻身奴隶一起劳动,收益很大。当时,方国瑜先生也去了。我们从凉山回来后,黎澍先生写来一封信,说你们给《历史研究》写个稿件吧,方国瑜先生让我写,我就写了。去大凉山的共有四个人,我说还是以小组的名义署名吧。黎澍回信说,不要小组的名义,要以本人的名义。我坚持说,还是我们四个人的名字,如果单独署我的名字,我们四个人的关系就不好了。发表在《历史研究》的这篇文章,是黎澍约的稿。黎澍现在去世了,是不是?

李:那时我的工资才120多元,一下子收到800多元,所以那时正是我交好运的时候(笑)!当时正在进行工资改革,高教等级分为12级,学校把我树为四级标兵,评的时候我正在北京,怎么评的我不清楚。回云南后,我才发现自己交了好运,收到了一大笔稿费,工资又提了两级。当时老师一般只提一级,我一年就提了两级。当然,我原来的工资太低了,为什么低呢?因为《解放初》有一段时间我离开云大,省政府文管会派我当云南省图书馆的馆长,我只在云大教一门选修课,所以云大两次工资改革都没有我的份,我的工资还是老样子。没有钱怎么办呢?我们系有一位姓江的教授,他很有钱,知道我困难,就借给我钱。我当时想,你借给我钱当然好,我很感谢,但

我怎么还呢?心里啊老是犯嘀咕。稿费这笔钱来了,工资又提高了,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还人家钱,我当时说要还他利息,他说算了,就当庆祝你。债还清了,我又带着小孩到商店里买了三件棉大衣,我自己一件,大儿子李伯重一件,女儿李伯敬一件。儿子穿上棉大衣后,说穿大衣真暖和啊!那时确实很穷,有了《历史研究》这笔钱后,生活大为改善了。《历史研究》稿费这么多,是出乎我意外的。那时《历史研究》稿费分为12个等级,第一个等级是郭沫若、范文澜他们的文章,我的文章被列为第二等级,是很高的,我真是有点受宠若惊。

仲:那时《历史研究》的稿费的确不低。

李:我们在北京开会的时候,侯外老来过会场一次。那是一个盛大的会议,全国的教学大纲会议,杨秀峰、周扬等都来了,很重视这个会。杨秀峰和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两位联名宴请全体代表。我和韩国馨先生坐在同一张桌子上。韩国馨先生和侯外庐先生有旧,韩先生对我说,我们去向侯外庐先生敬酒怎么样?我说好。于是我们两人到他的桌子那里去。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侯先生,如果不是韩先生带我去的话,我根本不知道哪一位是侯先生。敬完酒后,侯先生对我们俩说,历史研究所聘你们为兼任研究员。我当时不知道说什么好,只说谢谢,谢谢!其实,我当时的心里就像谢安听到了淝水之战胜利的消息(大笑)。按当时的规定,做兼任研究员,要给我1/4的工资,我在云南大学的工资200元,这样就要给我50元,一直给了我10年。10年中,这笔钱给我很大的帮助,同历史所的关系也比较密切。反右斗争开始后,我不了解情况,对历史系总支书记说,按照规定,我应该到历史研究所工作一段时间。他说我去问一问学校党委书记。党委书记不敢当。我们两个人一块吃饭,一块去,一块来。图书馆不开门的时候,我们就去万牲园(动物园)或北海玩。我们朝夕相处,直到离开北京。后来我在云南农村劳动整整一年,当时云大分批参加劳动,一去就是一年,主要是讲师以上的教授。我是第二批去的。除了春节回来一次,其他时间不能回家。劳动锻炼对我倒也是好事,以前我肩不能挑,手不能提,不到两个月,我就能和生产队里的强劳动力一样劳动。劳动对我很有好处,一年到头,我跟农民同吃同住。以前我不知道农业生产是怎么回事,通过劳动了解了。另外一个好处是,我到凉山两个月,在那里跟翻身奴隶一起劳动,收益很大。当时,方国瑜先生也去了。我们从凉山回来后,黎澍先生写来一封信,说你们给《历史研究》写个稿件吧,方国瑜先生让我写,我就写了。去大凉山的共有四个人,我说还是以小组的名义署名吧。黎澍回信说,不要小组的名义,要以本人的名义。我坚持说,还是我们四个人的名字,如果单独署我的名字,我们四个人的关系就不好了。发表在《历史研究》的这篇文章,是黎澍约的稿。黎澍现在去世了,是不是?

李:那时我的工资才120多元,一下子收到800多元,所以那时正是我交好运的时候(笑)!当时正在进行工资改革,高教等级分为12级,学校把我树为四级标兵,评的时候我正在北京,怎么评的我不清楚。回云南后,我才发现自己交了好运,收到了一大笔稿费,工资又提了两级。当时老师一般只提一级,我一年就提了两级。当然,我原来的工资太低了,为什么低呢?因为《解放初》有一段时间我离开云大,省政府文管会派我当云南省图书馆的馆长,我只在云大教一门选修课,所以云大两次工资改革都没有我的份,我的工资还是老样子。没有钱怎么办呢?我们系有一位姓江的教授,他很有钱,知道我困难,就借给我钱。我当时想,你借给我钱当然好,我很感谢,但

里哪有歌颂老子的。《光明日报》理论部有个肖黎,我很佩服他的见解。

李:肖黎有本书叫《司马迁评传》,前后两次讲到这个问题,他认为司马迁很尊重老庄的思想。这就很矛盾啊,司马迁既尊重老庄,又拿过来批,为什么要在《货殖列传》里来批?《史记》不是有他们的传吗?为什么不在那里批?这一点我实在是有点不理解,“文革”后我花脑筋最多的就是这篇札记。我想司马迁引老子这段话,不是没有原因的,他不是为了批判老子。我从《货殖列传》抓住了一个线索,这就是改善生活。“生活”两个字就是他用的。我抓住了改善生活这条线,那么,生活的最高境界就是老子的这个话。就为分析这个问题,我写了这篇札记。这篇文章的责任编辑叫宋超。我后来给高世瑜写过一封信,我说你们把我的文章发表出来,我很感谢,但宋超帮我改了一个字,恐怕不是我原来的意思。

李:我在北京开会的时候,侯外老来过会场一次。那是一个盛大的会议,全国的教学大纲会议,杨秀峰、周扬等都来了,很重视这个会。杨秀峰和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两位联名宴请全体代表。我和韩国馨先生坐在同一张桌子上。韩国馨先生和侯外庐先生有旧,韩先生对我说,我们去向侯外庐先生敬酒怎么样?我说好。于是我们两人到他的桌子那里去。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侯先生,如果不是韩先生带我去的话,我根本不知道哪一位是侯先生。敬完酒后,侯先生对我们俩说,历史研究所聘你们为兼任研究员。我当时不知道说什么好,只说谢谢,谢谢!其实,我当时的心里就像谢安听到了淝水之战胜利的消息(大笑)。按当时的规定,做兼任研究员,要给我1/4的工资,我在云南大学的工资200元,这样就要给我50元,一直给了我10年。10年中,这笔钱给我很大的帮助,同历史所的关系也比较密切。反右斗争开始后,我不了解情况,对历史系总支书记说,按照规定,我应该到历史研究所工作一段时间。他说我去问一问学校党委书记。党委书记不敢当。我们两个人一块吃饭,一块去,一块来。图书馆不开门的时候,我们就去万牲园(动物园)或北海玩。我们朝夕相处,直到离开北京。后来我在云南农村劳动整整一年,当时云大分批参加劳动,一去就是一年,主要是讲师以上的教授。我是第二批去的。除了春节回来一次,其他时间不能回家。劳动锻炼对我倒也是好事,以前我肩不能挑,手不能提,不到两个月,我就能和生产队里的强劳动力一样劳动。劳动对我很有好处,一年到头,我跟农民同吃同住。以前我不知道农业生产是怎么回事,通过劳动了解了。另外一个好处是,我到凉山两个月,在那里跟翻身奴隶一起劳动,收益很大。当时,方国瑜先生也去了。我们从凉山回来后,黎澍先生写来一封信,说你们给《历史研究》写个稿件吧,方国瑜先生让我写,我就写了。去大凉山的共有四个人,我说还是以小组的名义署名吧。黎澍回信说,不要小组的名义,要以本人的名义。我坚持说,还是我们四个人的名字,如果单独署我的名字,我们四个人的关系就不好了。发表在《历史研究》的这篇文章,是黎澍约的稿。黎澍现在去世了,是不是?

李:那时我的工资才120多元,一下子收到800多元,所以那时正是我交好运的时候(笑)!当时正在进行工资改革,高教等级分为12级,学校把我树为四级标兵,评的时候我正在北京,怎么评的我不清楚。回云南后,我才发现自己交了好运,收到了一大笔稿费,工资又提了两级。当时老师一般只提一级,我一年就提了两级。当然,我原来的工资太低了,为什么低呢?因为《解放初》有一段时间我离开云大,省政府文管会派我当云南省图书馆的馆长,我只在云大教一门选修课,所以云大两次工资改革都没有我的份,我的工资还是老样子。没有钱怎么办呢?我们系有一位姓江的教授,他很有钱,知道我困难,就借给我钱。我当时想,你借给我钱当然好,我很感谢,但

里哪有歌颂老子的。《光明日报》理论部有个肖黎,我很佩服他的见解。

(下转第8版)